

# 城市发展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王 颖

**Abstract:** The research of city development started from the discussion about "small county, big problem" in new period. The prophase of it focuses on the extroverted development of city, which pays more attention to urbanization pattern; the anaphase of it emphasizes the internal development of city, which refers to some problems about self modernization of city, such as management system, organization structure, civil society and administration mode. The researchers' perspective no longer lies on the way of rural population, but converts into the self-development and self-construction of modern city. Also, researchers not only describe the situations through social investigation, but attend and direct the practice, and they can get lots of first-hand materials at the same time. The research of city development will concentrate on two aspects in future: 1) city administration, survival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of democratic system in grass roots and civil society; 2) urbanization of rural area, city system, statue of big city, and sub-urbanization.

## 一、引 言

在经历了十几年城市化模式的争论之后,社会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界对城市发展的关注,终于由城市的外向发展回到了城市自身的内在变革。

自1983年费孝通先生提出了“小城镇大问题”以后,以城市规模为取向划分城市化道路的讨论贯穿80年代,直到90年代中期,成为城市发展研究的焦点问题。然而20年的城市发展道路,使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城市化的某些历史阶段是不可逾越的,城市化带来的人口集中现象也是不可避免的。人们不得不承认城市化自身的规律性,不得不面对由“隐性城市人口聚集”(城市外来人口)带来的大城市迅速膨胀,城市问题层出不穷的现实。于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城市自身的现代化,逐渐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

进入90年代中期,社会科学界开始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社区服务、社区建设和城市管理体制的改革上来,对街居制的改造首当其冲。社会学的理论视野也开始由城市人口聚集模式,扩展到社区文化、市民自治与参与、城市治理方式以及相关的价值观念更新。由经济体制改革引发的社会变革,最终向政治体制发起了挑战,特别是在错综复杂的城市内部组织结构领域。

在当前世纪之交的特别时刻,理清城市发展研究的思想脉络,揭示理论工作者对城市发展所作的思想贡献,探讨城市发展研究的未来趋势,无疑对深化改革、加速城市现代化、促进社会变迁,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 二、城市外向发展研究: 关于城市化模式的争论

### 1. 非城市化论

此种观点认为:“城市化道路不是一切工业化国家的必由之路,工业化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必然导致城市化。而在社会主义社会,工业化却完全可以不走城市化的道路”;“继续走城市化道路的意见,将给我们的实际工作带来危害。因为既然把城市化视为我国的必由之路,也就必然按照城市化的标准来要求我国的城市建设事业。这样一来,就将导致错误”。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是完全可以走上工业农村化的道路的”(陈可文、陈湘舸,1982:27—32)。

陈可文等人提出非城市化道路以后,除80年代初期有过1至2篇附和性文章,以及陈的校友蔡德蓉(蔡德蓉,1983)写了一篇与其商榷的文章之外,学术界主流、政府、社会各界对此观点基本上没有给予关注。但是该文中关于“集镇不应纳入城市范畴”的观点,却与一些人的观点不谋而合。比如后来的“农村集镇化道路”,以及评价城市化水平时,将镇区非农人口排除在外的做法(朱剑红,1998),都是受计划经济残留的城乡行政性划分影响的结果。

这里我们不想过多地评论非城市化观点,因为它基本上是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思想残余,看问题不客观,意识形态色彩过于浓厚。

### 2. 以城市规模为取向划分城市化模式

关于中国城市化道路的讨论,一直存在着几种意见相左的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于:中国的城市化应以哪种规模的城市发展为重点。主要有这样几种观点,小城镇论,中等城市论,大城市论,均衡发展论。

①小城镇论 小城镇论的主要观点是,为了避免出现西方国家曾经出现过的城市发展、乡村凋敝,避免出现发展中国家大城市过度城市化的现象,中国城市化应大力发展小城镇,小城镇发展起来后,可以起到蓄水池的作用,将农村转移出来的人口留在当地,这样既可以减轻大中城市的人口压力,减少社会振荡,增强中心城市的幅射作用,还可以发展乡村的城市化,振兴农村经济,以此实现中国的城市化、现代化。<sup>①</sup>

关于小城镇的讨论,一直持续了十几年。在80年代,还曾出现了更极端的观点——集镇化论。其观点是“应建立起一个面宽量大的集镇网络,使农村地区数以万计的大批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陈湘舸,1984)。“乡村集镇化是我国农村城市化的一条独特道路”(任清尧,1985)。作为小城镇观点的一种极端化的发展,可以说这种观点在一段时间内还是有一定市场的,如邹农俭还撰写了《集镇社会学》(1990)。但社会学内部的主流学派,仍然是小城镇论占上

① 持此种观点的研究者很多,仅列举几篇有代表性的著作和论文:  
费孝通等,1984,《小城镇大问题——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论文集第一集》,江苏人民出版社。  
杨重光、廖康玉,1984,《试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经济研究》第8期。  
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课题组,1996,《江苏小城镇建设的社会目标和基本经验》,《社会学研究》第4期。  
刘凌、戴进,1995,《人口大城市化是发展经济的前提吗?》,《世界经济导报》4月8日。  
税尚楠、吴希翎,1995,《试论我国的乡村城市化道路》,《经济地理》第2期。  
刘方明、刘凤彦,1984,《也谈农村城市化问题》,《农村经济问题》第7期。  
张净宗、张占耕,1985,《新技术革命与小城镇及其对策》,《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第4期。  
吴大声等著,1988,《论小城镇与城乡协调发展》,《社会学研究》第2期。  
赵昌,1990,《城市化道路问题反思》,《兰州学刊》第1期。  
李梦白,1990,《中国城乡关系的发展方向——乡村城市化》,《平原大学学报》第1期。  
朱通华,1990,《小城镇建设与中国城市化道路》,《江海学刊》第5期。  
费孝通,1993,《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我一生的研究课题》,《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风。小城镇论后期也针对乡镇工业“遍地开花”的情况，提出了乡镇企业发展要适度集中的观点，并为中央采纳。

②中等城市论 此种观点认为“中等城市是一定区域内的经济中心，数量多，分布均衡，是联系广大农村和大小城市的桥梁，起着承上启下的纽带作用，可塑性大，社会问题少，因此发展中等城市在我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经济学动态》编辑部，1986：171—172）。宋书伟提出：“走西方发展大城市的道路，一是客观条件不允许，二是容易出现‘现代城市病’；在农村就地实现城市化，由于传统农业社会结构的惰性太强，阻力太大，同时自然条件也不允许。采取中间突破带两头的办法——直接有计划地建设和发展中等城市（20—50万人），吸引广大农村和大城市的人力与物力向它转移集中，才能解决上述问题。”<sup>①</sup>此种观点，既反对小城镇论，同时也反对大城市论，在中国城市化道路的讨论中，独树一帜。

③大城市论 这种观点认为：人口向城市集中，尤其是向大城市集中，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中国也不能例外。不把大城市发展作为城市化的重点，就不可能带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他们还认为以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道路只能使工业象一棵“长不大的小老树”，农村中大多数剩余人口的出路也主要是农民自己兴建的大中城市。<sup>②</sup>显然，这种观点是针对小城镇论而来的。理由其一是大城市发展是发达国家城市化的规律，中国不可能例外。其二是以小城镇发展作为中国城市化的主要道路或唯一道路是“危险的”，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而且造成污染的扩散、工业经济的停滞不前。

④均衡发展论 均衡发展论也可以称作城市体系网络论。其主要观点是：中国的城市化应该建立以大城市为领导，以中等城市为骨干，以各类小城镇为基础的多层次多功能的网络系统（王颖，1985；方向新，1989；牛凤瑞，1995；）。显然，均衡发展论与前几种论点有所不同，它是从城市体系的角度来讨论中国城市化模式的，而前几种观点的讨论，则是在城市化体系之下，围绕中国现阶段首先应发展哪种规模的城市为焦点展开的。而其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是以城市规模作为讨论的出发点。

以城市规模为焦点的讨论，是因小城镇论的出现而引发的。在争论过程中，小城镇论在最初阶段占有绝对优势。积极发展小城镇不仅被写进中国城镇发展规划，而且变成了事实。从1978年至1996年的18年间，县级市成倍增长，由93个增加到445个，新增城市总量为473个，其中除少数为恢复性城市，其他绝大多数都是由县级以下的小城镇发展而来。在这473个新增城市中，有393个发展为拥有20万人以下的小城市，有80个成长为20万人口以上的中等城市。<sup>③</sup>与小城镇论相比，中等城市论和大城市论在最初的十几年里，并没有得到学术界和政府的多少认同，但随着近年乡镇企业村庄化和工业污染的失控状态、以及乡镇企业在土地和经济效益上的不经济，引起越来越多人的注意。此外，近年来大城市引人注目的快速发展，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中国社会学年鉴，1979—1989》，102。

② 此种观点有代表性的文章有：

胡兆量，1980，《大城市的超前发展及其对策》，《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第6期。

宋丁，1985，《人口城市化与大城市发展》，《城市改革理论研究》第1期。

何维凌，1986，《城市、工业、土地》，《世界经济导报》，7月7日。

许善达，1985，《试论我国城市化新机制、城市系统结构与对策》，《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第3期。

李迎生，1988，《关于现阶段我国城市化模式的探讨》，《社会学研究》第2期。

张正河、谭向勇，1998，《小城镇难当城市化主角》，《中国软科学》第8期。

③ 数据引自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编，1990，《中国城市四十年》，中国统计信息咨询服务中心、国际科技和信息促进中心有限公司联合出版，第1页。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编，1998，《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7》，第13、30页。

大规模吸引外来人口能力的增强,使大城市论的声音明显增强。但与最初中等城市化论和大城市化论不同的是,人们在指责小城镇战略的同时,并没有局限于关于城市规模的讨论,而是向更深的城市化的内涵、城市化的动力、城市化所具有的普遍规律等方面展开讨论。当然,这种讨论建设性的意见还不多、还不够成熟,更多地是寻找以往城市化失误的地方。但无论如何,关于城市化模式的讨论是越来越深刻了。

### 3. 从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内外部因素划分

陈彤在他的专著《城市化理论·实践·政策》(1993)中,根据影响城市增长的内外部因素,提出可以将城市化模式划分为三种类型:即内生导向型,外向刺激型和混合推进型。

与城市规模划分法不同,陈彤的划分法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分析城市化的模式,这就是推动城市化的动力。陈彤划分法认为各国城市化背景不同是十分重要的。先发展起来的国家,基本上是在相对封闭的情况下进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其动力来源在本国本地区。而其后就有所不同了,日本比欧美早发达国家发展迟一些,但又比后发展国家早,因此,日本的城市化过程反映出半自主、半依赖的性质。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经济的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各国经济的互相依赖性越来越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关起门来走工业化城市化道路。因此,后发展国家应该充分认识自己城市化过程中的时代背景,寻找出最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 4. 依照工业发展与城市化发展之间的协调性划分

1996年谢文惠、邓卫在《城市经济学》(1996:66—70)一书中,根据工业发展与城市化发展的协调性将城市化状态分为三种不同的模式:发达国家的同步城市化,逆城市化,发展中国家的超前城市化和滞后城市化。同步城市化是指发达国家的工业就业率与城市化水平基本上是同步增长的。逆城市化是指大城市的人口和经济活动部分地由城市中心向城市外围迁移和扩散,使郊区无限蔓延,并导致城市中心区和中心城市的衰退。超前城市化或曰过度城市化是指城市化速度大大超过工业化速度,造成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脱节。比如1990年阿根廷城市化水平高达86%,墨西哥、巴西等国的城市化水平也都在70%以上,与欧美国家持平,但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却比这些发达国家低很多。滞后城市化是指城市化水平落后于工业化进程的现象,从而使城市化水平不能真实反映经济发展的水平(彭明,1998:359;简新华、刘传江,1997)。

此种分类法的积极意义在于,通过分析比较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发展水平与城市化发展水平之间的协调性,来判断其城市化的状况,判定其城市化发展水平的适度性。我们以为,超前与滞后是一些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阶段性特征,同步城市化是一种理想模式,是与超前、滞后相对而言的,而逆城市化则是后工业时期某些发达国家城市化出现的现象,与前三种阶段性特征不具有共同性。因此城市化阶段性特征不能称作城市化模式,它们不属于同一时段,其划分的标准不同。但我们仍然认为,这种分析问题的方法是很有意义的。

### 5. 以人口迁移的动因划分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张正河、谭向勇根据世界城市化过程中人口集中的方式,提出职业转换先于地域转移,以及先地域转移后职业转移的两种城市化模式。他们指出,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是职业转移先于地域转移,也就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道路。虽然有数以千万计的乡村—城市的流动人口,但不稳定,呈准城市状态。而世界上出现过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方式主要有英国的圈地运动方式、德国容克赎买方式、美国农民自由迁移方式、苏联指令性迁移方式等,都是先地域转移而后进行职业转移(张正河、谭向勇,

1998)。

他们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中国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式的乡村城市化道路,使我们背离了世界城市化进程中人口集中的规律,乡村工业化没有带来相应速度的城市化,也没有出现人们预期的乡村城市化,行政性限制减缓了中国城市化的步伐。

## 6 小结:大胆走向城市化

长期以来,由于“先生产后生活”、“重生产轻消费”、“缩小三大差别”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和政治思想强化教育,使惧怕城市化的思想根深蒂固。最先提出的小城镇论恰恰反映了这样一种思想意识。胡耀邦在1980年到云南视察时讲:“要使农村里面的知识分子不到大城市来,不解决小城镇问题就难以做到”(费孝通,1984:7—8)。小城镇论设计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乡村城市化道路,将工业和人口留在了乡村,使小城镇第三产业因人口规模不足而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减低了小城镇的人口聚集效应。这不仅限制了小城镇自身的发展,同时也阻碍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导致了中国城市化的滞后。另外,政府长期形成的对城市化的恐惧心理(认为城市人口是包袱),更加重了中国城市化水平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的状况。应当设市的不能设市(如12万人口的浙江省龙岗镇,因是乡镇级所以不能设市),应当纳入城市人口的城镇外来人口被排斥在外。结果造成城市发展体系和城市人口的失控,带来日益严重的土地流失(因乡村土地不受严格控制)和大量隐性城市人口所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使城市管理陷入困境。

小城镇论期望的一步跨入乡村城市化阶段并没有成为现实。因为中国进行的“乡村地区城市化”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乡村城市化不可同日而语。西方发达国家的乡村城市化是在城市化的高级阶段,城市先进的科学技术、生产方式扩展到农业和农村,对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村生活方式加以改造,使城市与乡村在这两方面彼此接近,城乡差别逐渐缩小,乡村居民的组成不再是单一的农民,在城市工作在乡村居住成为时尚,城市变成科技中心、网络中心、金融中心、信息中心,而非居住中心。城市形态也发生了变化,大城市演变为“大都市连绵区”、“都市联合区”,单一中心结构的城市“开始由一种规模更为庞大、布局更为松散、没有中心或多中心的复合结构所代替”(孙群郎,1998:126)。

与西方不同,中国的“乡村城市化”却是乡村地区城市化,尽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的推动力量,很大程度上来自乡镇企业迅速崛起,但仍不能称作乡村城市化,而只能算作工业化推动的乡村地区城市化,从现在看,仍属于城市化过程的迅速崛起期。这种计划外工业化带动的行政性乡村地区迅速的城市化,能否避免西方发达国家先集中、后分散的城市化道路,能否避免发展中国家过度城市化的问题,不能下简单的结论。中国所以能够对大城市规模进行相对有效的控制,并不是因为“中国乡村城市化”多么成功,而是因为严格的户籍制度和严厉的行政手段。尽管如此,大城市紧闭的大门还是因市场经济的建立而被外来人口冲开了。

近期关于其他模式的讨论,基本上可以说是对最初阶段城市化的反思,是将中国城市化与世界城市化模式进行比较后,指出中国城市化存在的问题,以及对应当怎样改进的对策探讨。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认为城市化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该走的路还要走,如果硬要用行政性命令强行阻止人口向城市、城镇的集中,其结果只能是与城市化背道而驰,或延缓城市化的发展速度,出现“隐性城市化”、“乡村工业非城市化”等现象。

目前,关于城市化模式的讨论仍在继续进行之中,中国究竟应当怎样走自己城市化的道路,仍然是一个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我们认为,今后更值得人们关注的问题却是,打破对城

市化的恐惧心理,大胆走向城市化,敢于直面城市化所带来的各种问题,积极主动地去解决。躲避城市化,以行政手段强行划分城市与乡村,只能使自己陷入更大的困境。

### 三、城市内向发展研究:社区建设与城市管理

社会学界对社区研究并不陌生,甚至可以说是相当熟识。因为是社会学首先将社区概念引入中国,并使之为社会所广泛使用的。但是,社区本身又是一个具有多重定义的概念,即使在中国社会学界也是如此。使社区与城市社会内部结构联系起来的研究,仅仅是最近三四年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是近一二年的事。虽然时间很短,但近年关于城市社区与城市管理的研究,却已逐渐显现出社区研究正在摆脱纯粹描述性的调查,开始在社会结构理论的指导下,深入到社会实践中去,参与和指导社会实践的发展,并已取得显著效果。这也许是社会学在中国发展的又一特殊时期。

#### 1. 作为社会调查单位的早期社区研究

中国社会学界关于社区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40年代。其特点是以某一村庄社区作为调查基地,开展就某一内容的详尽调查,极细致地描述该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其代表作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和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

1979年社会学重建之后,社区研究被看作是一个区别社会学与其他学科的重要方法而被广泛采用。第一阶段是对“微观”社区一如以一个村庄或一个居委会为单位进行社会某方面状况或综合状况的描述和分析。比较有代表性的如: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对北京市宣武区椿树胡同就居民生活、家庭婚姻所进行的调查。第二阶段是就某一个社会现实问题对各种不同类型的地区进行调查和分析。比较有代表性的如:费孝通领导的“江苏省小城镇调查”(费孝通等,1984;张雨林等,1986);李汉林领导的“城市发展模式”研究(李汉林等,1988)。第三阶段,是以某一理论为指导,以某一地区为调查点,深入解剖该地区,努力寻找具有结构性变迁的要素和具有理论意义的问题。比较有代表性的如王颖、折晓叶、孙炳耀在浙江省萧山市进行的社团组织与社会中间层的调查(王颖等,1993);折晓叶在广东深圳宝安县万丰村进行的村庄再造的典型调查(折晓叶,1997)。

从中国社会学的研究史看,社区研究实际上是作为一种实证研究的方法,也就是将社区看作是一个调查单位,而社区的概念也是小到居委会,大到整个城、乡乃至地区。这种研究方法与英国早期以社区为单位的社会调查一脉相承,但却不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与城市内在发展有关的社区研究。我们所以要讨论早期的社区研究,其一是想让人们对中国邻里社区研究的源头有一清醒的认识,其二是想使人们通过社区研究本身的转变,看到社会学学术研究的飞跃,以及后来研究与先前研究的相关性。

#### 2. 从城市内向发展出发的邻里社区研究

城市邻里社区研究,最早可追溯到80年代末中山大学何肇发、丘海雄等学者进行的香港社区与广州社区居民归属感的比较研究(丘海雄,1989;何肇发、丘海雄,1992)。紧随其后的是1991年王思斌从现代公民素质角度进行的城市居民社区参与意识研究(王思斌,1991),以及梁维平、李虹从社区发展的原则和手段入手进行的社区发展研究(梁维平、李虹,1991)。这些从纯学术角度进行的城市邻里社区研究,为后来社会学界站在更高理论境界,直接参与、指导城市发展、城市现代化和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邻里社区研究,奠定了基础。但这些研究毕竟与

后来的社区研究不同。因此我们只能先对此作简单的勾勒,以便突出后来与城市发展同步的、从结构理论出发的社区研究。下面我们将依据 90 年代中后期社区研究的理论线索进行叙述。

①从社会保障出发的社区服务研究 进入 80 年代中期,北京、天津、广州、上海等大城市先后以居委会为单位,开展起以扶贫济残、尊老爱幼、教育失足青少年为内容的社区服务。1987 年民政部在武汉召开了社区服务工作座谈会,社区服务以各城市居委会为龙头蓬勃开展起来。在此基础上,社会学界和社会科学界以社会保障为理论指导的社区研究也开展起来。他们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引发了种种城市社会问题,使城市居民及其家庭同整个社会乃至政府,产生了一致的社会保障需求,这是城市社区服务迅猛发展的社会背景(唐钧,1992)。一些学者为衡量社区老年人服务、残疾人服务及优抚服务等建立了指标体系(孙金富、冯贵山,1992)。他们指出城市人口的急速老龄化,使老年社会保障、老年人的需求要社区来承担(周家振,1995;张锡康,1995;夏学銮等,1996)。

这种从建立社区社会保障体系出发的社区研究,很明显是为了解决改革不断深入、城市迅速发展所带来的原有“单位保障制”瓦解后的问题。这些学者的看法是,由单位保障制下分解出来的社会保障职能,应该逐渐地转移到以社区为主体承担者的社区社会保障。至少社区可以在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完全转变过来之前,担负起社会保障承担者的职能。即使在今后的发展中,社区仍然可以通过尊老爱幼等道德规范的培育,担负起满足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特殊需求和特殊心理需求的社会保障功能。这是其他组织形式的社会保障所不能替代的。

②社区建设与城市现代化研究 伴随城市社区服务由社会照顾对象向全体市民的转变,90 年代中期,以社会保障为对象的社区服务研究逐渐由更具综合性的社区建设所替代,成为 90 年代中后期城市发展研究的主流。这时期研究者的理论视野渐渐扩展到城市现代化领域。

这些学者认为,要解决现代城市所出现的问题,要实现城市的现代化,就必须将社区——这个城市基础细胞建设好。最初的研究是从社区文化建设与城市文明社区开始的。他们认为:社区文化是社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它应该是社区居民广泛参与的、涉及文艺、科普、教育、体育、卫生等方面内容的地域性文化现象(龚学平,1995)。此外还要突出社区教育,培养市民的社区意识,以营造城市的文化氛围(王毅萍,1997;丁曦林,1996;课题组,1996;文军,1998;梁平波,1997;于海,1997)。

与社区文化研究同时期,还有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社区建设与城市现代化的关系。吴铎指出,城市社区被认为是现代化城市的基石,城市现代化程度愈高,基础越要坚实(吴铎,1996)。王宝娣撰文从社区建设管理机制的角度,论述了社区建设对提高城市现代化管理水平的重要意义(王宝娣,1996)。任远指出,社区是中国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载体和体制(任远,1997)。徐传德阐述了社区服务的城市现代化发展功能(徐传德,1997)。

③市民社会与城市治理理念的研究 如果说前几个阶段的社区研究以纯理论性和对社会实践的总结为主,那么到了 90 年代末,城市社区研究者则开始在现代城市管理、市民社会、社会结构等理论的指导下,直接参与、指导社区建设的实践,使城市走上了理性化发展的道路。正如《解放日报》记者董宁所说:1997 年底,上海市的“部分专家、学者开始眼光向下,步出书斋,传播社区理论,与实际工作者共同研究解决实践中的重点、难点。”;而半年后,这些学者的研究视野已经从最初政府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渗透到社区建设的各个领域,到 1998 年中后期,居委会、居民议事会、业主委员会等市民自治、中介组织成为研究的新热点。这些学者除开设各种讲座外,有的还担任了社区建设的顾问(董宁,1998)。当前的社区研究,应当说已经发

展到了一定的理论高度,社区研究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归纳这一时期的社区研究,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伴随“二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城市管理体制的改革(即向街道下放财权和人事权,以加强街道的管理职能,从下岗职工中招聘干部以加强居委会的办事能力),社区研究首先对城市管理体制的改革作出了反映。他们指出:随着城市社区管理在上海现代化城市管理中的作用日益突出,相应的行政体制改革与发展就显得更为重要(杨建荣,1998;刘君德、宋迎昌,方晓,1999)。

第二,在参与社区建设的实践过程中,社区研究者们又将眼光转向了更深层次的社会结构领域。他们看到居民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转变,因而提出应当以新的方式重建社区共同体,以社区作为城市社会的基础结构,重构城市社会。社区重建的新方式,就是加强民主,使我国政治组织制度和协商制度深入到基层社区,使基层社区成为党的主要政治资源(卢汉龙,1999;赵树国等,1999;时永福等,1999;庞玉珍,1999)。

第三,在关注城市社会结构的同时,一部分社区研究者又将眼界转向了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民主自治、城市治理等政治体制改革领域。记者开始报道“民主楼院”、“这里也有人民小会堂”,指出民主政治是我国保持社会稳定、深化改革、向现代化强国迈进的一大法宝(时永福等,1999)。孙洁怡开始深入调查社区居民的自治问题(孙洁怡,1998)。王刚和罗峰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指出,现代化的进程是政府自上而下和社区自下而上的互动过程。社区参与的兴起不仅能实现社区价值融合,推动社区发展,而且作为基层民主的最广泛的实践,是社会进步和政治发展的结构性驱动力和生长点(王刚、罗峰,1999)。王颖在调查研究了现代大城市的社区发展之后指出,单位制解体,特别是住房制度改革和城市管理体制的改革,为具有真正意义的“市民”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市民对自身利益的关心,以及街道、居委会主动变管理为服务,社区管理由单一管理者、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向多元参与的协商式网络管理转化,使社区这个以往的纯居住单位变成了具有多种功能、提供全方位服务的社会利益整体,构成整个城市的基础组织单位,和城市政府与社会新的组织整合点;并最终导致城市治理方式由“眼睛向上”的官本位集权式管理,向“眼睛向下”的人本位多元民主协商式的网络管理转变。城市政府工作口号由“一切以经济工作为中心”到“人民满意就是最大的满意”的转变,就是明证(王颖,1999a b)。

#### 四、小结:城市发展研究的走势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的思想脉络反映了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脉络,至少是展示了社会学研究水平逐渐提高的清晰线索,以及社会学在城市发展问题上不同时期不同的关注视点、最新的研究方式和逐渐深入的理论探讨。

##### 1. 理论视野的扩展

客观地说,从小城镇开始,社会学一直非常重视理论联系实际,注意用研究成果直接参与、指导社会实践。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比较小城镇研究和社区研究——特别是后期从城市发展角度进行的社区研究,就可以发现两种研究的理论视野是不同的。前述研究的理论视野相对较窄、较陈旧,不承认工业化、城市化的客观规律,以30年代乡村手工业的理论来指导80年代初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因此虽然在最初市场经济没有建立的情况下,确有成效。但也给后来的



城市发展带来许多问题。后期社区研究的理论视野显然更开阔。他们将经济、政治等学科的相关理论融入自己的研究之中,在继承社会学前辈参与和指导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世界上最前沿的学术思想,深入研究中国城市发展的现实,因而能够取得更好的指导社会实践的效果,同时在理论研究上有所突破,引起社会和学术界的重视。

## 2 以现代意识指导社会实践

在指导社会实践的方法上,后期的社区研究有独到之处。以往在指导社会实践上,社会学者总希望走上层路线,以一篇文章被某领导看重为标准。而后期的社区研究则不同,他们是直接参与城市社区建设方案的制定,亲自向城市政府基层组织的干部讲授社区建设的知识,亲自指导社区民主建设,并在一系列参与社会实践中,发展社会学的理论。当然部分原因是政府工作方式的转变,以及社区研究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它的研究方式,但同时也显示了社会学工作者走出书斋、走出经院哲学、走出官本位思想的历史性进步。

## 3 理论与实际研究的有机结合

后期社区研究还表明,社会学者已经从照搬西方理论,从社会实践中任意抓取例证的做法,转变到深入中国现实,在一定理论指导下,参与指导社会实践,并根据实践的结果总结出适合中国自己的社会学理论。应当说,这种方法,并不限于后期的社区研究,许多其他有价值、有理论深度的社会学实证研究,也都具有这种性质。这说明,中国社会学研究水平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提高。

## 4 城市发展研究的思想脉络

从小城镇研究开始,城市发展研究始终没有脱离理论联系实际的实证研究轨迹,而且可以说每一个研究成果都在不同程度上引起了社会的反响。但是正如我们上面所说,在以什么样的理论、怎样联系实际、引起怎样的社会反响、怎样指导社会实践等方面,各时期、各个不同项目的研究有着很大的不同。除此之外,从城市发展研究的思想脉络中我们还可以清楚看到,研究者对城市发展的研究是先从城市外部开始,经过要不要城市化、应当优先发展多大规模的城市、中国城市化的道路究竟应当怎样走、中国不同地区城市发展模式的研究、城市邻里社区居民归属感研究、从社会保障的视角研究城市社区服务、从城市自身现代化角度和城市社会结构角度研究社区建设、从体制改革、市民社会和城市治理理念的角度研究城市社区的争论。沿着这条研究的线索,不难看出,社会学界对城市发展的研究,是由外及内、由浅及深、理论指导越来越强,而纯描述性、不做任何解释、不具有任何理论意义的实证研究,越来越少。这是非常令人欣慰的迹象。它说明了社会学研究水平的提高,社会学研究人员理论素养的提高。

但社会学对城市发展的研究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在现代城市发展这个关系中国现代化前途的问题上,社会学界并未给予相当的重视,除小城镇和其他少数研究外,关于城市外向发展的研究,大多是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而在后期的社区研究中,不重视理论指导和理论探讨的研究仍然很多。这都是应当注意的。然而无论如何,社会学对城市发展的研究是大大地向更高理论层次发展了,而且已经在具体指导城市内在发展上做出了看得见的贡献,不仅增加了社会学的社会应用性,同时在实践中充实丰富了社会学的理论。

## 5 城市发展研究的未来趋势

从城市外向发展与内在发展两个不同方向的研究看,在新的世纪里,城市发展研究将会沿着这样几个方向发展:

第一是城市化及城市体系研究,现在已经不必再争论城市化模式了,而是加强研究怎样消

除以往计划经济下行政性划分城乡及城乡人口所带来的一系列观念及政策问题,建立新的划分标准,主动推进城市化而非农民的“就地城市化”(这种城市化带来的问题极大)。只有主动建立城市体系,将应该纳入城市的镇乡及其人口,纳入城市规划范畴,才能有效避免土地浪费、城市无序发展、出生人口控制不住等问题。主动建立自己的城市体系,比被动地应付许多“既成事实”要好得多。

第二,是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发展问题。现在一些大城市已经出现了郊区化趋势、内城人口绝对减少以及城市区位上的两极分化问题。比如上海和北京。因此今后大城市研究将会成为城市发展研究的一个重点。

第三,城市内在发展,除社区建设与管理外,城市文化、城市组织、城市管理、社会治理方式、市民社会等,将成为城市发展研究的新重点。

第四,城市内在发展的研究,将会对大城市以外市、镇发展起指导作用。现代大城市管理体制变革,突破了几千年传统行政组织方式,不仅可以促进大城市自身管理的现代化,同时将对全国城市、城镇起到示范作用。因此,今后城市内在发展研究,将不会仅限于大城市,还会深入中小城市及城镇。

第五,城市社会公平问题将会成为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因为在城市外来人口与城市原有人口之间、富有者与贫困者之间、“高尚社区”与普通社区之间的矛盾将会加深,两极分化在城市区位上的表现将会引起社会不公和社会冲突。因此社会公平也会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焦点。

参考文献:

陈可文、陈湘舸, 1982,《论城市化不是唯一的道路》,《求索》第5期。

陈彤, 1993,《城市化理论·实践·政策》,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陈湘舸, 1984,《集镇化道路》,《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丁曦林, 1996,《社区,城市文明建设的载体——关于上海社区建设的讨论之一》,《文汇报》3月4日。

董宁, 1998,《上海社区理论研究有新发展——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紧密结合》,《解放日报》6月17日。

方向新, 1989,《我国城市社会化道路的抉择与城镇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人口学刊》第6期。

费孝通, 1984,《小城镇 大问题》,《小城镇大问题——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论文选第一集》,江苏人民出版社。

龚学平, 1995,《加强社区文化建设,推动社会文明进步》,《解放日报》10月22日。

何肇发、丘海雄, 1992,《香港社会问题的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

简新化、刘传江, 1997,《从外国的城市化看中国的城市化》,《城市问题》第5期。

《经济学动态》编辑部编著, 1986《1984年经济理论动态》,人民出版社。

课题组, 1996,《社区建设是创造现代都市文明的载体和依托》,《解放日报》1月24日。

李汉林等, 1988,《寻求新的协调——中国城市发展的社会学分析》,测绘出版社。

梁平波, 1997,《文明社区建设调查研究》,《浙江社会科学》第11期。

梁维平、李虹,《社区的发展历程与当代实践》,《社会学研究》第2期。

刘君德等, 1999,《上海城市边缘开发区的管理体制改革探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卢汉龙, 1999,《单位与社区:中国城市社会生活的组织重建》,《社会科学》,第2期。

牛凤端, 1995,《中国城市化应走大中小并举的道路》,《中国农村观察》,第1期。

庞玉珍等, 1999,《社会整合模式的转型与社区发展》,《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3期。

彭明, 1998,《第四座丰碑 非赶超战略——中国发展新战略》,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

蔡德蓉, 1983,《略论我国城市化道路与城乡管理体制——与陈可文、陈湘舸商榷》,《求索》第5期。

- 丘海雄, 1989,《社区归属感》,《中山大学学报》第2期。
- 任清尧, 1985,《乡村集镇化与集镇建设》,《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3期。
- 任远, 1997,《论社区服务的城市现代化发展功能》,《南京社会科学》第2期。
- 时永福等, 1999,《民主楼院》,《中国社会报》3月17日。
- 时永福等, 1999,《走出“单位群落”》,《中国社会报》3月2日。
- 孙洁怡, 1998,《社区组织与社区居民自治意向》,《社会》第11期。
- 孙金富、冯贵山主编, 1992,《上海市社区服务与发展指标体系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孙群郎, 1998,《美国现代城市郊区化及其社会影响》;载王旭、黄柯可主编,《城市社会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折晓叶, 1997,《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王宝娣, 1996,《探索社区建设管理新机制,提高城市现代化管理水平》,《文汇报》3月28日。
- 王刚、罗峰, 1999,《社区参与:社会进步和政治发展的新驱动力和生长点——以五里桥街道为案例的研究报告》,《浙江学刊》第2期。
- 王思斌, 1991,《我国城市居民社区参与意识探析》,《社会工作研究》第2期。
- 王毅萍, 1997,《关于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思考》,《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第6期。
- 王颖, 1985,《世界城市化模式与中国城市化道路》,《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149期。
- 王颖, 1999a,《谁来做小区的主人》,《中国社会报》3月8日。
- , 1999b,《市民自治与社区管理方式的变革》,10月提交福特基金会的研究报告。
- 王颖、折晓叶、孙炳耀, 1993,《社会中间层,改革与中国的社团组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文军, 1998,《我国城市文明社区建设》,《城市发展研究》第3期。
- 吴铎, 1996,《上海城市社会结构与功能现代化——城市社会学面向21世纪的思考》,《社会学》第4期。
- 夏学銮主编, 1996,《社区照顾的理论、政策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
- 谢文惠、邓卫, 1996,《城市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
- 徐传德, 1997,《论社区服务的城市现代化发展功能》,《南京社会科学》第2期。
- 杨建荣, 1998,《强化城市社区行政体制改革》,《解放日报》9月21日。
- 于海, 1997,《文明社区的文化内涵》,《社会》第9期。
- 张锡康, 1995,《社区“银发工程”探析》,《社会学》第2期。
- 张雨林等, 1986,江苏省小城镇课题组,《江苏小城镇建设的社会目标和基本经验——江苏省小城镇研究综合报告》,《社会学研究》第4期。
- 张正河、谭向勇, 1998,《小城镇难当城市化主角》,《中国软科学》第8期。
- 赵树国等, 1999,《一个关系到城市社会重构的重要问题——对城市社区建设的调查与思考》,《山东社会科学》第1期。
-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 1989,《中国社会学年鉴·1979—1989》,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周家振, 1995,《兴办社区老年保障事业初探》,《社会学》第2期。
- 朱剑红, 1998,《改革为城市发展带来机遇——我国已有城市六百六十八个,城市化水平近百分之十八》,《人民日报》10月6日。
- 邹农俭等, 1990,《集镇社会学》,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杜 芷